

評介 Charles Hartman, *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: Sources and Narratives 960-1279 CE*

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21.

張維玲\*

2016年，蔡涵墨(Charles Hartman)教授出版了論文集《歷史的嚴妝——解讀道學陰影下的史學》(中華書局)，以「文本考古學」的研究方法，揭示了南宋史學與政治史的內在連動，引起學界的熱烈回響。<sup>1</sup>但是，這本論文集僅是作者端上的前菜，2020年十月出版的《製作宋代史——材料與敘事》才是作者推出的主菜。目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正著手翻譯此書，預計在2022年下半年出版。蔡涵墨教授是紐約州立大學奧巴尼分校(University at Albany,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)東亞系(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)榮譽教授，也是該系的創系者。作者長年研究宋代史

\*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研究助理教授

<sup>1</sup> 書評有：湯元宋，〈陰影下的真實——評蔡涵墨《歷史的嚴妝——解讀道學陰影下的南宋史學》〉，《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》，2017(北京，2017)，頁214-220；尹航，〈蔡涵墨《歷史的嚴妝——解讀道學陰影下的南宋史學》〉，《唐宋歷史評論》，2018(北京，2018)，頁237-249；虞雲國，〈秦檜專權形象的自型塑與被型塑〉上、下，載於2018「澎湃新聞」，[http://m.thepaper.cn/renmin\\_prom.jsp?contid=1973531&from=renmin](http://m.thepaper.cn/renmin_prom.jsp?contid=1973531&from=renmin)，擷取日期：2020年10月30日；謝一峰，〈南宋史學的三重陰影〉，載於2018「找話題」，<https://toments.com/679482/>，擷取日期：2020年10月30日。

學史與政治史，在歐美學界與東亞地區擁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。

全書除了前言與結論外，又分為上、下兩篇。上篇的主題是探討宋代最重要的幾位史家與史籍：《宋會要》、李燾(1115-1184)與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(以下簡稱《長編》)、李心傳(1166-1243)與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(以下簡稱《要錄》)、道學史家與史學、元代編《宋史》。作者將這幾部史籍放回其撰寫的脈絡，從而指出過去被認為客觀可信的《宋會要》、《長編》、《要錄》，其實都受到編者的政治立場，以及他們所處的政治環境的影響；而過去被認為編修草率的《宋史》，實際上充分體現了元代史家的政治關懷。這幾部史籍(《宋會要》北宋所編部分除外)，又在不同的時刻參與、強化了「Grand Allegory」(宏寓)的形塑。

下篇探討宋代歷史「Grand Allegory」的形成。Grand Allegory 或可翻譯為「大寓言」，或「宏喻」。Allegory 係指透過一個故事或敘事，來傳達帶有道德判斷的訊息，「寓言」應是較為準確的翻譯。不過，中文的「寓言」多半探討個別人物故事的道德訊息，本書指涉的 Grand Allegory 則是特殊政治環境中的產物。因此，此處將之翻譯為「宏喻」。作者使用 Grand Allegory 而非 metanarrative(宏大敘事)或 metahistory(元史學)，用意則是區別後現代史學認為歷史敘事幾乎等同小說的觀點。<sup>2</sup>

宏喻包含三大主題：(1)太祖仁政、(2)慶曆、嘉祐、元祐對太祖仁政的恢復與實踐、(3)姦邪宰相對祖宗仁政的破壞。「宏喻」訴說著這樣的故事：在天命支持下，宋太祖(960-976)重建了上古堯舜的仁政，他任用儒家官僚，結束長期藩鎮割據。此後，外戚、宦官、軍人等小人，背棄了太祖仁政，並集結在邪惡宰相底下，破壞祖宗之政。儘管儒家

---

<sup>2</sup> 參見 Hayden White, *Metahistory: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-century Europe* (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, 1975).

官僚不斷抵抗這些邪惡力量，並成功在慶曆(1041-1048)、嘉祐(1056-1063)、元祐(1086-1094)時期恢復了太祖仁政，但在 1067 年新法之後，趙宋陷入了支持太祖仁政的儒家官僚，與背棄仁政的邪惡勢力間的循環。

本書最精采的論點之一，是指出「宏喻」其實是南宋儒家士大夫對北宋歷史的詮釋，也宰制南宋以降，甚至當代學者對宋代歷史的認識。作者更敏銳地指出，「宏喻」實際上不是所有政治群體的共識，甚至不是每個君主都認同的價值，而是政治場域中儒家士大夫的主張(頁 17-18)。「宏喻」背後的潛台詞是：宋代政治理當由儒家士大夫主政，如果權力落在姦相、武官、外戚、近習、宦官手中，政治將出現極大危機。這樣的價值體系，至今仍深刻影響當代的政治史研究。

那麼，「宏喻」是在怎樣的脈絡下誕生的呢？作者從南宋初新法遭到顛覆性批判的政治脈絡來解答這個問題。1130 年代，高宗(1127-1162)與趙鼎(1085-1147)為肯定其政權合法性，提升了太祖、慶曆、嘉祐、元祐的政治價值。元祐時期，在舊黨執政的背景下，范祖禹(1041-1098)編寫《仁皇訓典》，主張應仿效仁宗(1022-1063)，並將仁宗的仁政，追溯到太祖(頁 280)。不過，北宋後期新黨長期執政，范祖禹的觀點並未獲得重視。1130 年七月，范祖禹的兒子范冲(1067-1141)將《仁皇訓典》上奏給高宗。此時，失去生育能力的高宗，正決定將皇位繼承轉移給太祖後裔。在程頤(1033-1107)門徒胡安國(1074-1138)的支持下，程頤的道統論被高宗君臣充分利用。他們論述：從堯開始的道統，傳到了太祖，太祖將皇位傳弟而不傳子，體現了堯的禪讓精神；此道統又傳到高宗，因此，高宗同樣不將皇位傳子，而是將皇位轉移到太祖後裔。1162 年，高宗退位，尊號為「光堯」。1171 年又加上「體道」二字，呼應了這個在 1130 年代建立的政治論述(頁 281-282)。

在 1130 年代的政治脈絡下，經高宗授意，范冲於 1136 年整理了司馬光(1019-1086)《涑水紀聞》手稿(頁 261)。據李心傳《要錄》，這十

卷本的《涑水紀聞》「傳於世」(頁 267)。《涑水紀聞》是形塑太祖仁政的關鍵文本。其中，作者對「杯酒釋兵權」故事的分析，充分體現了「文本考古學」(textual archeology)的研究方法，值得在此作較仔細的介紹(頁 295-311)。

「杯酒釋兵權」訴說太祖如何巧妙地結束武人專政的五代(907-960)，也被當代學者用以證明宋代重文輕武或重文抑武。作者比對了此故事在《涑水紀聞》與兩個早期版本：丁謂《談錄》與王曾《筆錄》間的差異。相較於內容較簡略的兩個早期版本，《涑水紀聞》中，太祖和禁軍統領石守信(928-984)、王審琦(925-974)等人的對話變得栩栩如生。李燾在《長編》中，感嘆國史與實錄都不載此故事，因此《長編》正文主要採納《涑水紀聞》的版本。但李燾在評注指出這個版本的內在矛盾：故事開頭，趙普(922-992)將五代政權更迭的原因歸結為「節鎮太重，君弱臣強」。但在隨後的宴會上，太祖卻建議石守信等人解除禁軍統領的兵權，到地方任節度使。李燾藉著製造正文與評注間的緊張關係，讓讀者思索：為何在《涑水紀聞》的版本中，太祖解決禁軍統領兵權太重的辦法，是讓他們擔任趙普所謂造成政權不穩定的地方藩鎮？

作者巧妙之處在於，將這個矛盾敘事放到范冲整理《涑水紀聞》的 1130 年代，而不是 960 年代的政治脈絡來解讀，從而指出《涑水紀聞》故事版本對藩鎮問題的凸顯，是更適合高宗君臣取法的「祖宗故事」。南宋初年，地方上的鎮撫使，以及五大「家軍」，都使南宋初的局勢近似藩鎮割據的局面。1132 年底，高宗向宰相呂頤浩(1071-1139)談到：「唐末五季藩鎮之亂，(趙)普能消於談笑間，如國初十節度，非普謀亦孰能制？輔佐太祖，可謂社稷功臣矣。」(頁 302)足見高宗將太祖與趙普合作解決藩鎮問題，視為值得效法的故事。1141 年四月，南宋版的「杯酒釋兵權」真實上演。高宗與秦檜(1091-1155)將韓世忠(1089-1151)、岳飛(1003-1142)、張俊(1086-1154)召來西湖聚會，勸他們放棄對家

軍的控制，以交換他們擔任樞密院的長官。換言之，《涑水紀聞》版本所凸顯的太祖與趙普對藩鎮的整頓，更加適合高宗與呂頤浩、趙鼎在整頓地方軍事強人時，以祖宗之法之高度加以引用。

相較於過去學者們爭論「杯酒釋兵權」是否真有其事，「文本考古學」的高明之處在於，不僅比對一個故事的早、中、晚期版本，而且將該故事在各版本間的演化過程，放在故事被書寫，或開始廣泛流傳的時代脈絡中來解讀。於是，這個表面上的宋初故事，實際上更能訴說的是南宋初的君臣心理。這樣的解讀，不僅是探索祖宗故事如何被篩選、利用，更闡釋了這樣的篩選與利用機制，如何反過來加工製造出更為流行的祖宗故事，甚而改變、重塑祖宗的形象。

如果說高宗初期是「宏喻」浮現的關鍵時期，孝宗朝(1162-1189)編纂的幾部史籍，就強化了這個敘事的典範性。作者分析《宋會要輯稿》與《長編》在北宋各朝史料的分佈比例，發現《長編》中慶曆與元祐時期的史料比例遠超出《宋會要輯稿》(頁 87)。另一部影響甚鉅的文本，是趙汝愚(1140-1196)在 1186 年上奏的《皇朝奏議》。這個奏議選集明顯偏愛慶曆、元祐大臣。例如，趙汝愚沒有選用反對慶曆改革的呂夷簡(979-1044)奏議，但他的兒子呂公著(1018-1089)，作為元祐大臣，被選了 36 篇。獲選最多的則是司馬光，被選了 146 篇(頁 237)。這意味慶曆改革與反新法的正當性被凸顯，相對的，反對慶曆改革與支持新法則被消音。此外，朱熹(1130-1200)編的《五朝名臣言行錄》，亦用大量篇幅凸顯太祖、慶曆、元祐的政治價值(頁 168)。這幾部孝宗朝編就的文本，既受「宏喻」的影響，同時也參與、強化了「宏喻」史觀。

南宋後期，隨著程朱理學越來越盛行，「道學史學」取得主導性地位。道學史家對「宏喻」的全面擁抱，使得在此敘事之外的觀點，逐漸被淘汰。以李燾、李心傳為代表的四川史學家，儘管也支持、參與「宏喻」的構築，但他們「討論」式的史學方法，經常是將同一事

件的不同說法，用正文與注解互相對話的方式呈現，為讀者提供更複雜的歷史圖像(頁 85-86；124)。相對的，道學史家則強調歷史作品應傳遞明確的道德價值(頁 148-149)。南宋晚期，陳均(1174-1244)與呂中(1247 年進士)兩位福建道學史家的史學作品，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。呂中的《大事記講義》，更是在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的基礎上，演生出更適合道德說教的「講義」體裁(頁 158)。不過，相較於李燾大量引用元祐大臣的奏議，陳均與呂中並未如此偏重元祐時期的史料，但他們加重了太祖朝的史料比重，以強化太祖仁德聖君的形象(頁 169-170)。顯示這些南宋史家雖維護「宏喻」的歷史觀點，但他們的史料編纂策略仍存在差異，反映了他們仍保有選編史料的能動性。

在南宋後期道學式史學流行的背景下，「宏喻」的第三個組成「姦相系譜」逐漸成形。韓侂胄(1152-1207)發動慶元黨禁後，遭黨禁者將自己的命運比擬為元祐黨禁的受害者，或遭秦檜迫害的道學家與大臣(頁 320-321)。此處，作者指出一個過去被忽略的事實：直到開禧北伐以前，秦檜在官方歷史中的形象，一直相當正面，他被視為促成宋金和議的功臣(頁 318)。不過，私史的力量不斷挑戰官方的秦檜形象。(頁 316-317)。1206 年，韓侂胄在北伐前，將秦檜的諡號改為「謬醜」，開啟了官方史學重新評價秦檜的契機。李心傳在《要錄》中，已刪去原始材料對秦檜正面形象的表述。韓侂胄政權垮台後，李心傳受命編修南宋前四朝國史。在李心傳與其他十三世紀的史家手上，秦檜的國史傳記，已由正面轉為負面形象(頁 318)。至此，從蔡京(1047-1126)、秦檜、韓侂胄的姦邪系譜成形，並用以解釋太祖仁政為何遭到破壞。此後，士大夫們不斷將他們認為道德敗壞的宰相加入到這個系譜之中。隨著晚宋史彌遠(1164-1233)與史嵩之(1189-1257)遭到在朝、在野士大夫的批評，二史也成為這個系譜中經常佔席的名字(頁 324-327)。

相較於大多數現存南宋人寫的北宋歷史，都受到「宏喻」的左右，

「宏喻」誕生前的北宋編《會要》部分，則呈現頗為不同的面貌。以宋真宗、仁宗兩朝為例。真、仁兩朝《會要》，分別源自 1044 年王洙(997-1057)上奏的《會要》，與 1081 年王珪(1019-1085)續編的《會要》。儘管仁宗在位四十二年(1022-1063)，遠超過真宗在位的二十五年(997-1022)，但在今存《宋會要輯稿》中，真宗朝的條目竟略多於仁宗朝。仁宗朝《會要》內容的相對短缺，可能因王珪編《會要》時，新法正如如火如荼展開。王珪曾說，《會要》是士大夫在尋找前例(precedents)時最方便的資源。仁宗朝故事在改革派眼中，不僅參考價值較低，且往往是他們所要改變的(頁 45)。這顯示《會要》亦非中立客觀的官方檔案編輯，而是供當前政治參考的前例彙編，從而受編輯當下的政治風向所左右(頁 26)。

與仁宗朝相對的，是真宗朝史料在《宋會要輯稿》中頗為豐富。比對《宋會要輯稿》與《長編》，可發現《長編》所編錄的真宗朝史料，遠少於《宋會要輯稿》的份量(頁 86)。這顯示李燾對真宗朝史料做了諸多刪減。對真宗朝的相對輕視，被陳均、呂中所繼承(頁 154)。南宋史家對真宗朝的淡寫，與他們不認同真宗的天書封禪事件，有絕對的關係。總之，在真宗朝史料的文本考古學上，《宋會要輯稿》是更為原始而重要的底層。

元代編《宋史》則充分體現晚宋道學史家擁戴的「宏喻」觀點。過去學者多半認為《宋史》編纂倉促，許多傳記僅是將官方檔案複製、貼上。作者則將《宋史》的編纂，放回元末政治脈絡中，提出新解。1340 年代，元代朝廷陷入了以伯顏(1280-1340)為首的蒙古本土主義，與以脫脫(1314-1356)為首的儒家官僚集團的鬥爭。後者以儒學聚合彼此，並使用道學式的語言，《宋史》就是他們用這樣的語言撰寫的作品。《宋史》總裁官歐陽玄(1283-1358)、張起巖(1285-1353)都是 1315 年元代第一屆科舉進士，他們是元代科舉採行道學知識文本的受益者。此時，

他們藉著編修《宋史》，一方面傳達自己對道學的擁護與繼承，另一方面也為脫脫政權進行辯護(頁 181-185)。

作者透過比對成書於 1186 年的《東都事略》與元代編《宋史》，指出《宋史》許多貌似隨意的編輯，實際上蘊含編者藉著「宏喻」史觀以譏諷時政。例如，相較於《東都事略》對北宋前四位君主都加以肯定，《宋史》則僅給予太祖與仁宗正面的評價，背後乃暗示忽必烈(1260-1294)是如宋太祖一般，重視儒家士大夫政治的君主(頁 185-190)。元代史家亦常藉著在傳記中摘引奏議的方式，來傳達他們的政治理念。例如蘇軾(1037-1101)、蘇轍(1039-1112)的傳記，大篇幅徵引了他們攻擊新法的奏議。《宋史》也充滿了明示、暗示 1067 年是宋朝歷史轉折點的觀點(頁 203)。相較於《東都事略》頌讚司馬光的一生，《宋史》對司馬光評論，則集中描述 1086 海內百姓引頸期盼司馬光拯救他們於新法之水火。作者指出，《宋史》編者的用意，必須放在 1086 與 1340 相似的政治情勢中來解讀。他們將伯顏的蒙古中心主義、任用技術官僚，比作王安石(1021-1086)的新政，司馬光的儒家政治，比作脫脫政府(頁 208-209)。因此，儘管《宋史》存在編輯缺乏規律的問題，其史觀卻是內在自洽的(頁 185)。

總體而言，作者展示了宋、元最知名的幾位史家，不僅身處在宋代歷史「宏喻」的形成脈絡中，更藉由他們編撰的史書，參與、強化了「宏喻」。在此過程中，儒家士大夫的私人史學觀點，不斷向官方史學滲透，最後全面主宰了後人對宋代歷史的認識：范冲整理的《涑水紀聞》，使司馬光的私人筆記得到官方的背書；李燾在《長編》中，尊元祐、反新法的觀點，也隨著他擔任史官、編纂北宋後四朝國史，進入官方史料；李心傳對秦檜的負面評價，在南宋後期得到官方歡迎，從而改寫了秦檜的歷史形象；最後，儘管元代史家能夠看到趙宋實錄、國史(儘管不完整)，但這些元代史家認為必須以私史補充官史的不足，

且採納了宋末被廣泛接受的「宏喻」史觀。

本書尚有一個亮點。在作者徵引的 268 種二手研究中，高達 132 種為中文專書或論文。這在過去宋史英文專著中是絕無僅有。除了反映作者充分吸收中文學界對宋代史學史、政治史的研究外，更關鍵的是，本書的對話對象同時包含西方學界和中文學界。例如，本書開篇，引述了鄧小南教授對「活的制度史」的見解，在第六章則扼要指出《祖宗之法》的精彩之處(230-231)。讀者不難發現，「祖宗之法」與「宏喻」既是彼此呼應，更是互相補充。正是因為宋代儒家士大夫不斷根據當前的政治需求篩選祖宗之法，宋代歷史的敘事才不斷被改變，從而在汴京陷落、反新法的政治脈絡下，出現推尊太祖、慶曆、元祐的「宏喻」史觀。「宏喻」在南宋浮現與強化的歷史過程顯示，祖宗之法不僅是儒家士大夫龐大的政治資料庫，這個篩選機制與過程，也使一些特定的故事被改寫、放大，從而調整甚至改變後世史家對宋代歷史、祖宗之政的理解。

作者在書末，提示了下一部作品的主题——卸下「宏喻」的歷史巖妝後，如何更接近宋代歷史的真實面貌？作者認為，如果天真地相信「宏喻」，我們會以為趙宋是一個儒家士大夫主導的時代，但實際上，趙宋政權的參與者包含了大量非文人的技術官僚。因此，理解宋代政治的新模式，即是儒家官僚與技術官僚如何共生，這個共生關係有時候成功，但往往不成功(頁 333)。這個重新理解宋代政治的分析模式，很值得讀者期待。

從本質上來說，本書不應被歸為傳統的史學史著作，因為作者揭露更多的是宋代歷史敘事的形成史，以及這個形成過程如何折射出宋、元史家，在面臨當前政治問題時，一方面引用史料作為政治修辭，同時也篩選了史料、重新詮釋了歷史。總之，這部作品突破了學界對宋代史學與政治的理解框架，推進了學者對宋代歷史的認識。此後，

不僅在宋史研究的領域，在研究方法與視野上，只要是研究中國政治史或史學史，都不應繞過此書。

(本文於 2020 年 11 月 9 日收稿；2021 年 3 月 2 日通過刊登)